

重构与转型

《小说月报》(1910~1931)
翻译文学研究

石晓岩◎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重构与转型

《小说月报》(1910~1931)翻译文学研究

石晓岩◎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构与转型:《小说月报》(1910~1931)翻译文学研究 /
石晓岩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097-5139-8

I. ①重… II. ①石… III. ①小说-翻译-研究-
中国-1910~1931 IV. ①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4896 号

重构与转型*

——《小说月报》(1910~1931) 翻译文学研究

著 者 / 石晓岩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经济与管理出版中心 (010) 59367226

责任编辑 / 高 雁 李 佳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责任校对 / 卫 晓

项目统筹 / 高 雁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8.25

版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字 数 / 307 千字

印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139-8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项目批准号: 09YJCZH028)

本书获得海南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资助

(项目批准号: kyqd1020)

摘 要

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动力是双重的：一方面源于当时的文化规范和社会环境，以及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诉求；另一方面来自翻译文学的刺激和影响，翻译文学在文学革命的浪潮中是创新的主要来源。清末民初，我国的文学翻译活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五四以后。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在相当长时间内的互动，共同造就了与中国古代文学有别的“新文学”。翻译文学首先在文学语言和审美形式上在文学内部给传统文学以冲击。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导致了文学观念的改变，使小说、戏剧在文学系统中的位置由边缘向中心移动。外来的影响和自我的需要使西方文学的典范地位在清末民初就得到提升，实现了中西文学局部的沟通交流。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历史氛围提供了一个颠覆既有模式的历史契机。在西方范式与民族意识的共同作用下，新文学在语言、文体、理论、翻译、创作、批评各个方面的建构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契合，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培养了新文学的译者与作者，使文学摆脱了粗糙的启蒙工具和娱乐工具的地位，成为社会文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书以《小说月报》（1910~1931）为范本考察文学翻译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转型中的意义，是因为就翻译文学的输入而言，《小说月报》是近现代文学史译介数量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深远的文学期刊。《小说月报》不仅拥有高素质的作者群和译者群，更拥有为数众多的高素质的读者群。自1910年创刊以来，《小说月报》主编数次更迭，刊物的面貌和译介的重点也随之变化，几乎每次都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意味深长的文化事件。尤其是前后期《小说月报》中译作反映的文学观念和翻译策略有巨大的差异。《小说月报》在现代文学转型过程中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亦有时间跨度上的代表性，因此研究《小说月报》的译介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比较完整而生动地反映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文学观念的演进和新文学发

生发展的状况。

对《小说月报》翻译文学的研究,首先面临的是四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要翻译?翻译什么?怎么翻译?翻译的结果如何?本书前两章主要考察前三个问题。以1921年《小说月报》革新为界,整体观照和描述王蕴章、恽铁樵主编的《小说月报》(1910~1920)和沈雁冰、郑振铎等人主编的《小说月报》(1921~1931)的翻译文本、翻译观念、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等问题,分析中国文学在与域外文学的交流中出现的新质,体察民初文学前进路上面对西方文学的徘徊与犹豫,以及新文学为建构自身而取法西方时的矛盾与两难。本书后三章主要探讨第四个问题——翻译的结果。本书试图将微观层面的个案分析与宏观层面的整体考察相结合。在微观层面,本书从《小说月报》翻译文本、历史事件和编译者观点的分析入手,回顾语体文欧化大讨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学背景,辨析小说、戏剧、新诗等现代文体建构过程中与域外文学的碰撞和交流,考察新文学者引进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建设新文学的实践,从宏观层面考察翻译文学怎样参与并深刻影响了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现代文体格局的形成和现代文学理论空间的开创。从新文学发生的角度看,两者并不是分离的,《小说月报》“现代文学第一刊”地位的确立与现代文学对自身形象的想象和建构是同时进行的。

本书应用了比较文学的接受-影响研究方法和平行研究方法,以及译介学的研究方法和多元系统论等相关翻译理论。本书从翻译文学的角度切入,在既有文学范式崩溃与新文学范式确立的框架里,以《小说月报》为个案从细部考察转型的过程,描述和讨论新文学发生过程中某些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全书在力图给《小说月报》做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定位和总结的同时,尽可能回到历史现场,总结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

序

石晓岩女士请我为她的新著《重构与转型——〈小说月报〉（1910～1931）翻译文学研究》作序，读完书稿，我欣然命笔。

中国传统文学，蕴涵着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因子；而基督教文化，则是西方文学的文化基因。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西方文化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狂涛怒浪般地涌进中国，掀起了中西文化整合的高潮，萌生了中国现代文化。

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书籍由笔画构成的汉字写成，属于象形文字系统。西方书籍则由字母拼成的句式写就，属于拼音文字系统。那时懂外语的国人凤毛麟角，国人要读西方的书，认识国门外的世界，只有通过翻译这不二途径。中国的翻译事业，沿着自然科学—人文学术—文学艺术的路线发展。与此同时，报刊和出版业的兴盛，使得刚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迅速进入社会，得以传播，产生影响。而且清末民初，随着留学生被大量派遣，翻译队伍中又出现了一支虎虎有声的生力军，翻译水平大为提高。

自梁启超倡导“三界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来，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有人统计过，1902～1916年所创办的文艺期刊就达57种。其中49种创办于商业发达的上海，两种创办于香港，九省通衢的汉口和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各新办了一种（这个统计并不完全，有的地方办的文艺期刊未包括在内）。而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期刊，则数《小说月报》（1910～1931）。

《小说月报》不但荟萃了中西优秀文学作品，而且还大量刊载和评介西方文学理论、文学思潮。现代文学许多著名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徐志摩、梁实秋等，时常在这块文学园地发表译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与文学思潮的文章；沈雁冰先是在此发表译介外国文学的文章，然后以

茅盾的笔名，与巴金、丁玲等一样，在这家刊物上将自己的处女作奉献给大众，从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如果说前期《小说月报》为新文学的诞生做好了充裕的铺垫和准备；中期为新文学的萌生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的话，那么在后期则展示了新文学的成熟。毋庸讳言，在当时众多的文学期刊中，《小说月报》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应该是最大的，难怪日后会成为研究者最关注的对象之一。

研究《小说月报》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及其贡献的成果，可谓多矣。石晓岩这本著作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并不像其他研究者那样，对此全面进行论述，而是从社会的需要与文化语境的变化出发，选取该刊的翻译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这个热门话题，以小见大，探讨外国文学如何通过文艺期刊这个媒介促进本土文学创新与发展；本土文学又怎样从文学观念、艺术方法、题材及形式等方面，吸取异域文学的养料，实现自我嬗变与更新。同时，本书又能以小见大，从一个侧面比较完整而生动地反映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文学观念的演进和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如果重复别人的论调，没有新的发现，即使作者的文笔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这本书的价值首先在于，它不囿于在西方文学影响下建立了中国新文学这个在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论调，以翻译学理论为参照，考察了清末民初的翻译文学（其实就是西方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肯定翻译文学是中国本土文学创新的主要来源，它们共同造就了与中国古代文学有别的新文学。恰如著者所说，在西方范式与民族意识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新文学，“在语言、文体、理论、翻译、创作、批评各个方面的建构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契合，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培养了新文学的译者与作者，使文学摆脱了粗糙的启蒙工具和娱乐工具的地位，成为社会文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看法颇为新颖，又很有说服力。

其次，著者从大处着眼，把《小说月报》的翻译文学放在当时正在嬗变的文化语境中加以审视，同时又从细小处洞幽烛微，注意到该刊不同时期的几位主编王蕴章、恽铁樵、沈雁冰、郑振铎等在文化观念、审美趣味、翻译观念、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该刊选择翻译外国文学的文本、所使用的语言形式等大相径庭，因而所刊载的翻译作品译风不同，对处于转型时期中国文学的贡献也不一样。长期以来，学界在对《小说月报》历任主编的评价中，几乎都是贬低王蕴章、恽铁樵的，认

为他们把该刊办成鸳鸯蝴蝶派的阵地之一；认为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扭转了刊物的办刊方针，使之朝写实主义方向发展。难能可贵的是，著者从头至尾仔细地查阅了每一期《小说月报》，依据刊物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也参考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既不否认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后任主编的成绩，又实事求是地给予王蕴章、恽铁樵主编公正的评价，还区别了沈雁冰与郑振铎、叶圣陶等主编，在编辑发表外国文学译作时的不同编风及其对新文学创作的影响。

最后，著者将域外文学的刺激、影响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内在诉求结合起来，以《小说月报》为中心，探讨文学翻译在参与新文学建构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反映出中外文学交流中，文学观念演进和新文学发生发展的某些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著者不是满足于空泛的议论和抽象的推导，而是依据《小说月报》所发表的译本、评介文章，以及该刊所组织的几次关于小说、诗歌、戏剧和文学理论等重大话题的讨论，展现出翻译文学怎样参与并深刻影响了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现代文体格局的形成、现代文学理论的开创、现代文学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创新的过程，揭示了转型时期文学发展的某些方面，凸显了《小说月报》中的翻译文学在参与新文学建构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公正地将该刊评定为“现代文学第一刊”。这种建立在翔实材料上的论断，不但令人信服，而且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此外，著者在史料的发掘、目录的分类梳理上，下了一番功夫，为后来的研究者查找这方面的资料，提供了方便，能使他们少走弯路。学术史告诉我们，古往今来，任何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不会终结某一方面的学术探讨；它应能为后来者继续深入的探讨，起到借鉴和引路的作用。《重构与转型——〈小说月报〉（1910～1931）翻译文学研究》就是这样一部新见迭出、令人深思并为后来的研究者指路的学术著作。这正是这部颇见著者功力的学术著作价值之所在。

吴定宇

2013. 9. 10

目 录

绪 论 / 001

第一章 “开眼看世界”

——《小说月报》(1910~1920)的文学翻译 / 018

第一节 王蕴章：“名作”·“新闻”·“新理”·“常识” / 019

第二节 恽铁樵：“小说”·“大说” / 027

第三节 译籍东流：翻译小说的嬗变 / 043

第四节 从《娇妻》到《娜拉》：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误读 / 055

第二章 明流与潜流

——《小说月报》(1921~1931)的文学翻译 / 064

第一节 沈雁冰：“进化的”与“民族的” / 065

第二节 郑振铎：“情绪”与“思想” / 078

第三节 多元系统视野中的《小说月报》 / 091

第三章 《小说月报》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 / 107

第一节 《小说月报》(1910~1920)的文学语言 / 108

第二节 西学东渐：文学翻译与语言重构 / 117

第三节 语体文欧化的讨论 / 127

第四章 消解与重构：翻译文学与文体格局的转换 / 139

第一节 翻译小说与小说观的演变 / 139



第二节 翻译“新剧”与戏剧转型 / 152

第三节 翻译诗歌与新诗发生 / 164

第五章 《小说月报》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开创 / 175

第一节 《小说月报》与自然主义 / 176

第二节 《小说月报》与新浪漫主义 / 191

第三节 “真”“善”“美”的权衡
——《小说月报》的译介策略 / 200

结 语 / 213

附录一 / 218

附录二 / 223

参考文献 / 272

后 记 / 279

绪 论

一 选题的目的、价值和意义

继六朝隋唐、明末清初两次翻译高潮之后，我国的翻译活动在清末民初形成了第三次高潮。与前两次翻译高潮不同的是：其一，近代翻译活动的主体不再是西域高僧或西方传教士，而是我国的知识分子；其二，随着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和理解程度的加深，以及对中华文明的反思，译介西书所涉猎的范围要比前两次广阔和丰富得多。1842年和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以及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天朝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盲目自信。此后，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从“器物层”到“制度层”到“文化层”向西方学习，翻译受到空前的重视。所谓“求西洋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首先被大力译介的是自然科学类的西书，而后是社会科学类的西书，19世纪末以后，域外文学的翻译也逐渐兴盛起来。

若将“中国翻译文学”界定为“中国人在国内或国外用中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①，那么近代的文学翻译当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最早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体裁是诗歌。1864年，英国使臣威妥玛将美国诗人郎费罗的《人生颂》译成中文，还请担任过户部尚书的董恂润色。董恂将威妥玛的9节译诗改译成9首七绝（严格地说，这首诗是他们合译的）。不仅如此，董恂还将译诗亲自抄在扇面上，托人送给万里之外的郎费罗本人，留下一段中外文学交流的佳话。接着，王韬和张芝轩于1871年合译了法国国歌《马赛革命歌》与德国诗歌《祖国歌》。随后，无名氏在1872年将英国

^①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5页。

作家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部分译出 8000 字,更名为《谈瀛小记》在《申报》上发表。自此以后,翻译域外小说逐渐成为一种文化风气。

1899 年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和 1902 年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中译介的政治小说是近代翻译文学高潮到来的表征,此后,文学翻译呈愈演愈烈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戊戌变法失败后知识分子将文学作为启民智、新民德的工具,提高了文学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是林纾文情并茂的翻译和域外文学的曲折情节及逸闻趣事引起了国人的兴趣。当时翻译文学进入中国主要通过图书和期刊两条途径。在《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卷》中收录的 1911~1950 年的 4400 余部外国文学论著中,五四之后翻译小说的数量最多不过 1500 种。施蛰存曾分析:1919~1949 年这 30 年和 1950~1990 年这 40 年外国文学译本的出版,很可能少于 1890~1919 年这 30 (29) 年,1890~1919 年应该是“迄今为止介绍外国文学最旺盛的时期”。^①除图书出版外,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文艺报刊是翻译文学传播的另一条途径。《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竞立社小说月报》《中外小说林》《新小说丛》《广东戒烟新小说》《小说时报》《中华小说界》《小说月报》《礼拜六》《小说大观》等期刊都刊载翻译小说,有的刊物上翻译小说还占多数。

对清末民初的翻译文学做以下粗线条的勾勒,我们看到译者们的翻译实践构成了多元的文学翻译图景:梁启超的《新小说》在教化宣传上发现了西方小说,林纾在艺术情调上发现了西方小说,李伯元的《绣像小说》、吴趼人的《月月小说》在国俗民情和趣味性上发现了西方小说,黄人和徐念慈的《小说林》在美的性质上发现了西方小说。从与域外文学交流的角度看,无论是梁启超对中国小说“综其大较,不出海盗海淫两端”^②的激烈抨击,或是侠人“吾国小说之价值,真过于西洋万万也”^③的盲目自大,还是林纾在小说技巧上“以中化西”地求同存异,早期的译者总是不由自主地拘囿于“中/西”优劣比较的框架,较少深入到文学本体层面。而愈到民初,对文学本体的认识功能、教化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的探讨

① 施蛰存:《导言·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上海书店,1990,第 18 页。

② 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一册(1898 年)。

③ 侠人:《小说丛话》,《新小说》第十三号(1905 年)。

愈多，在国俗民情和“美的方面”^①寻求中西之间的沟通对话比单纯的中西优劣比较进了一大步。

五四以后，在域外文学的推动下，中国文学现代思想意识凸显，传统文体格局发生裂变和重组，小说、戏剧、诗歌、童话、寓言、散文等现代文体格局渐趋成熟。编者注重对理论和文艺思潮的介绍，现代文学批评渐成规模。如果说清末民初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包括作家、作品的文类、内容等）鱼龙混杂、良莠并存，那么五四之后的译介则系统而深入，从对域外文学的国别、作者、作品等方面的选择可以看出译者建构新文学的自觉。从译介学的角度来看，考察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是件有意义的工作，因为目的语（target language）文学并不是源语（source language）文学的简单转换。源语与目的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增添、失落、变形等现象背后隐藏的是一系列文化密码，译者的文化心理、审美取向、知识结构等因素以及特定的文化环境都会对翻译文学的面貌产生影响。同时，译语文化中的政治、经济、文学观念等因素会直接影响编者的翻译策略——对域外文学的选择、阐释和接受。从译者对英、法、美、德等西方发达国家作家作品的选择、对东邻日本和西邻俄国的复杂态度，对北欧、东欧、亚非拉美等弱小民族文学由忽视到重视的态度转变，我们可以看出编者翻译策略后面的时代、社会、文学内部的深层动因。

从清末民初到五四前后的几十年里，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报刊一直是翻译文学的主要传播媒介。较之图书出版，报刊以其及时、迅捷、丰富、有效等特点在传播效果上更胜一筹。在翻译文本的选择和质量上报刊翻译也许不如图书出版那样精益求精，但是在文学史意义上报刊翻译要比图书出版更为重要，它反映的是动态的活生生的文学交流史。篇幅小、出版周期短、发行时间长的优势使报刊能更完整和更丰富地呈现不同时期翻译文学的趋势和重点，尤其是那些历史悠久、由名家执掌的文学期刊上的翻译文学，往往体现出前辈们对现代文学自我建构的多元想象。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书选取《小说月报》的翻译文学进行个案分析。就翻译文学的输入和影响而言，《小说月报》是近现代文学史上译介数量最大、寿命最长、影响深远的文学期刊。22年里，《小说月报》不仅拥有高素质的作者群和

① 摩西：《〈小说林〉发刊词》，《小说林》第一号（1907年）。

译者群,而且读者群庞大。若不是1932年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战火中毁于一旦,它的寿命会更长,影响会更大。自1910年创刊以来,《小说月报》主编数次更迭,刊物的面貌也随之变化,几乎每次都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意味深长的文化事件。《小说月报》1921年革新后,编辑方针、栏目设置、著译情况、文学观念及语言形式等转变明显,但对域外文学的翻译和评介热情却与前期《小说月报》保持一致,对世界文学的关注和借鉴以及对本土文学的反思和建构的追求始终不变。全部22卷262期的《小说月报》中共有2000余种译作(其中包括近1500种翻译文学作品),约占期刊文章总数的1/2(《小说月报》翻译文本目录详见附录二,按卷数、作品名、作者、国别、译者分类一一标注)。前11卷中大约有500篇翻译文学作品(其中包括470篇翻译小说、新剧和新诗),但此时直译、意译、译述不分,这个数字只是大概的统计。革新后的《小说月报》,除随译作同时刊出的大量外国名画、世界各国作家肖像以及海外文坛消息外,共有翻译文学作品1000余篇(其中包括919篇翻译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童话、寓言),占革新后11卷《小说月报》的一半左右。前11卷翻译文本主要集中在长篇和短篇小说,以及游记等纪实文学上。“瀛谈”“译丛”等栏目主要是对域外政治、军事、文化、科技、风土人情等知识的介绍。后11卷翻译文本则明确体现出新文学建设的主体意识,设置了评论、文学史、作家介绍、小说、戏剧、诗歌等栏目,对域外文学进行有的放矢地译介。前后期《小说月报》中译作反映的文学观念和翻译策略差别很大,但译作在篇幅上所占比例变化却很小,这充分说明了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重要地位。鉴于《小说月报》在清末民初文学向五四新文学转型过程中的文学史地位和时间跨度上的代表性,研究《小说月报》的译介情况可以较完整而生动地反映文学观念演进和新文学发生发展的进程。

本书的理论价值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期刊研究与译介学研究的结合。本书试图将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考察翻译文学与文学转型的关系。当下的期刊研究多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编辑与出版、市场与体制、社团流派与个人等角度,透视分析体现于报刊编辑、出版和报刊文本内部的诸问题,翻译文学很少独立成为报刊研究的考察对象。译介学研究则更注重考察不同民族语言转换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学与文化交流、译介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排斥以及

由于误读产生的扭曲与变异等文学现象，而较少在文学史整体框架内考察。本书一方面将《小说月报》的翻译文学作为文学研究的“资料库”讨论新文学的发生，重视它的期刊属性，从编辑、发行、期刊文本内部考察《小说月报》的译介特点。另一方面力求将翻译中的文学现象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注重翻译文学在参与新文学建构中发挥的作用，在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进行研究。

其二，域外文学的刺激和影响与中国文学现代化内在诉求的结合。现有的域外文学研究思路大多停留在域外文学作品、思潮、流派比较的层面上，而外国文学研究又往往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等同，将文学翻译看作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忽视了翻译实践在参与新文学建构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本书试图突破这种两极式的目的语/源语、翻译文学/外国文学的等同化处理方式，关注译者民族意识对译本选择和接受的影响，关注翻译文学进入中国的具体途径和方式。当我们审视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域外文学的大量翻译是客观事实，域外文学对文学转型产生的影响也毋庸置疑，但接受和影响的途径则因较复杂的因素而显得模糊，本书试图以《小说月报》为中心，从比较文学和译介学的视角整理和描述域外文学进入中国的方式与途径，以及域外文学向翻译文学转换过程中编者、译者对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想的操纵。

其三，力求以一种多元的、流动的文学史观深入考察新文学的发生问题，辨析新文学发生的多源流状态。从具体层面看，研究翻译文本有助于我们把握《小说月报》生存的历史情境，看 22 卷《小说月报》怎样参与建构并从一个侧面见证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从广泛意义上看，以《小说月报》为中心，窥斑见豹，分析翻译观念和文学观念变化和发展的深层原因，梳理翻译文本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文体格局、批评模式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可接近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生成现场。由于《小说月报》的特殊地位，中国新文学“发生”的一些历史问题可在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解决。

其四，以《小说月报》为个案考察翻译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更可以突破当下翻译文学研究的模式——在新的视野与理论观照之下，尝试建立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梳理期刊研究和翻译研究这两个新兴研究领域的内在联系，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富有建设性的材料。

其五，对近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促进。本书从翻译文学的角度切入扫

描《小说月报》，期望通过对《小说月报》的发展历史特别是翻译文学的历史进行全面、客观的梳理，对《小说月报》史料的收集和报史研究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并有利于以当代立场对《小说月报》进行尽可能客观的历史定位。

二 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对于《小说月报》的专门研究很少，研究重点多集中在对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所体现的沈雁冰文艺思想、郑振铎文艺思想的阐释和对文学研究会代用期刊的价值评判上，偶尔提及革新前的《小说月报》，也将其视为“鸳鸯蝴蝶派”刊物^①。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期刊研究的热潮中，对一代名刊《小说月报》的研究得到学界的热切关注，对《小说月报》的考察也比较深入和全面，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论文主要聚焦于几个方面：一是对《小说月报》的创作或批评进行宏观的考察；二是研究《小说月报》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会等文学流派的互动共生关系；三是将文学思潮、时代背景、编辑方针、栏目设置结合起来研究《小说月报》的现代文学观念；四是从期刊研究的角度切入，讨论《小说月报》对现代文学生产与传播、编辑与出版、社团与个人关系研究的启示意义。这些研究成果所讨论的问题为我们了解《小说月报》的全貌勾勒了大致的图景。2004年以后，柳珊、董丽敏、谢晓霞三位青年学者陆续推出三部论述角度不同但富含创新性的专著，将《小说月报》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殷克勤的《简论〈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②系列文章对《小说月报》发刊、发行情况，办刊人员及宗旨，刊物内容及特色，主要作家创作情况等进行全景式扫描，论述其沿革变迁情况并论证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杨庆东^③运用叙事学理论考察革新前的《小说月报》，分析中国小说叙事范式的现代性嬗变，从文言/白

① 张伯海：《能说〈小说月报〉是鸳鸯蝴蝶派吗？》，《新闻战线》1980年第5期。

② 殷克勤：《简论〈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扬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③ 杨庆东：《略论中国小说叙事范式在〈小说月报〉中的现代性转换》，《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